

# 论浙赣东古代心学与启蒙思想带

李宜春<sup>1</sup>李乐宇<sup>2</sup>

(1.宁波工程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研究所,浙江 宁波 315211;2.天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从南宋到清中期,浙东、赣东两地学者交往密切,陆九渊、杨简、叶适、陈亮、吕祖谦、吴与弼、娄谅、王阳明、王畿、罗汝芳、汤显祖、徐渭、刘宗周、黄宗羲、李绂、全祖望等学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为启发、影响或师承关系。浙赣东区域存在着一条连绵的心学思想带、启蒙思想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观。

**关键词:**浙赣东;心学与启蒙思想带;陆王心学;浙东学派

**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17)06-0116-09

从南宋到清中期,浙东、赣东区域存在着一条连绵的心学思想带、启蒙思想带,两地学者交往密切,具有明显的互为启发、影响或师承关系,形成了中国古代心学思想史、古代启蒙思想史乃至整个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奇观。

## 一、“浙赣东古代心学与启蒙思想带”概念的提出

赣东地区,是指今江西省上饶市(古有饶州、广信府等称谓)、抚州市和鹰潭市、景德镇市(后两者古代曾属于饶州、广信府辖区)等。钱塘江将浙江分为浙东和浙西。唐时浙江分为浙江西道、东道,宋时改称为浙江西路、东路。清乾隆年间《浙江通志》记载:“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大概而言,浙东是指今浙江省除杭、嘉、湖三市以外的地方。浙东、赣东在地理上又是一个毗连的区域。

宋代邵雍始将“心学”一词作为学术用语使用。自南宋以降,后人分别以朱熹和陆九渊为“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的代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杰出思想家为代表,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号召追求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中

国古代思想启蒙运动则突出个体的主体地位,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摆脱不合理的制度与社会现实对个性、个体的摧残与束缚,或主张学以致用,发展工商业,否认君主专制主义等。中国古代思想启蒙运动大多数情况下又与心学密不可分;明代中后期在浙东王阳明心学深刻影响下的文艺与社会思想解放运动是一个高峰,而黄宗羲所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则发出了中国古代启蒙的最强音。同时,在古代心学与启蒙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赣东南宋陆九渊的心学,南宋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杨简等“甬上四先生”,赣东元代吴澄草庐学派,赣东清代李绂穆堂学派等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王阳明又师承于明代赣东吴与弼、娄谅的崇仁学派,并深受师承于吴与弼的陈献章白沙学派的影响。由此,从南宋到清中期,浙赣东区域存在着一条连绵的心学思想带、启蒙思想带,两地学者交往密切,具有明显的互为启发、影响或师承关系。

## 二、宋元时期浙赣东心学与启蒙思想带情况——象山学派、慈湖学派、南宋浙东学派与草庐学派

南宋陆九渊的心学,是赣浙东古代心学与启蒙思想带之肇造。

收稿日期:2017-05-10

基金项目:宁波市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地2015年度项目

第一作者简介:李宜春(1972-),男,山东聊城人,教授,主要从事政治与行政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研究。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江西抚州金溪县人。曾在贵溪(今属鹰潭市)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山形如象,他自号象山翁,是宋明心学的开山鼻祖。他曾知荆门军,政绩显著。丞相周必大称赞说:荆门之政是陆九渊事事躬行的结果。他罢职还乡后,每开讲席,“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说:“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象山以自己之精神为主宰,——皆以讲不传之学为己任,皆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掀动一时,听者多靡。”陆九渊融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以及佛教禅宗有关论点,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形成一个新的学派——“心学”。他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人心中,心是唯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他在《语录》中说:“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须是放教规模广大。”<sup>①</sup>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

淳熙二年(1175),陆九渊在今上饶市铅山县的鹅湖寺与朱熹展开辩论,进一步阐发其“尊德性”和“发明本心”的“心即理”先验论。朱熹主张通过博览群书和对外物的观察来启发内心;陆九渊认为应“先发明人之本心,然后使之博览”,“心即是理”,无须在读书穷理方面过多费功夫。双方赋诗论辩。陆九渊有诗曰“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陆认为朱“支离”,朱认为陆“禅学”,两派争持不下。这就是所谓的“鹅湖之会”。但他们一直友谊敦厚,书信往来。<sup>②</sup>

南宋时期浙东的杨简、吕祖谦、陈亮等,则是深

受陆九渊心学影响的浙赣东启蒙思想带的重要人物。

“甬上四先生”是南宋时四位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学者的合称,即舒璘、沈焕、杨简和袁燮,他们是陆九渊最重要的弟子。因明州简称“甬”,地处四明山麓,又称为“四明四先生”“明州四先生”“淳熙四先生”。<sup>③</sup>清代全祖望称:“槐堂之学<sup>④</sup>,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杨简又被称为“象山弟子之冠”,是陆学的重要接续者和发扬光大者。

杨简(1141—1226),字敬仲,宁波慈溪人,因筑室慈湖即德润湖上,世称“慈湖先生”。陆九渊归家过境,杨简请教,“忽觉此心澄然清明”,遂拜陆九渊为师。心学的核心特征在于以“心”为本,而陆九渊的心学理论属于初创,显得粗糙而不成体系,杨简则将“心”之本体概念圆融化,将心学体系一元化,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心本体学说。他认为裂“心”与“道”为二,则是支离,批评孟子言“存心养性”是将心与性分二;批评《论语》把“道”割裂为四。他曾说:“少年闻先大夫之诲,宜时复反观。某后于循理斋燕坐反观,忽然见我与天地万物万事万理澄然一片,向者所见万象森罗,谓是一理通贯尔,疑象与理未融一,今澄然一片,更无象与理之分,更无间断,不必言象,不必言理,亦不必言万,亦不必言一,自是一片。看唤作甚莫,唤作天亦得,唤作地亦得,唤作人亦得,唤作象亦得,唤作理亦得,唤作万亦得,唤作一二三四皆得。”因此,陆九渊评价说:“我不说一,杨敬仲说一。”

南宋浙东事功学派既受陆九渊心学影响,又对王阳明、黄宗羲启蒙思想具有重要影响。就地域而言,主要分三支,即永嘉学派、永康学派和金华学派。他们都不忘靖康之耻,主张复仇、抗金、收复故土;反对“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倡言“四业皆本”;精研史学,主张经世致用;主张讲求实利功效、义利合一

① 《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② 对于朱、陆关系,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客观评述说,先生(指陆九渊)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紫阳(指朱熹)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归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③ 但四人学术风貌不同,“广平(舒璘)之学,春风和平;定川(沈焕)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杨简),云间月澄;瞻彼絮斋(袁燮),玉泽冰莹”。见宁波《郡学祠四先生文》。

④ 指陆象山江西籍弟子傅梦泉、邓约礼等人创立的学派。

的功利主义等。

薛季宣是永嘉学派的开创者,陈傅良是中坚,叶适是集大成者。叶适“以物为本”的思想是永嘉学派思想的精髓,认为充盈宇宙的是“物”,而道存在于事物本身,物之所在,道则在焉,“道不可须臾离物”,把“物”上升为一种本体性的概念。叶适认为义理不可脱离功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永嘉学派批判“农本商末”“重本抑末”“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认为“夫四民(指农工士商)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黄宗羲曾概括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永康之学的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字同甫,婺州(金华)永康人,世称“龙川先生”。他力主抗金,曾多次上书献中兴恢复之策,“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他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主张农商并重,提出“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认为道德与事功是统一的,反对将理与欲、义与利对立起来;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反对空谈性命。

金华之学又称婺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金华)人。因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故号东莱先生,同朱熹等友善,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金华学派贵涵养实践,力主“明理躬行”,经世致用,主张“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对各家学说广泛兼容与整合的“杂博”和“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是金华学派的基本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受陆九渊心学影响很大,浙东学派的心性之学深植于学派思想之中。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等人与陆九渊同气相求,特别是吕祖谦有很大的心学倾向,朱、陆“鹅湖之会”就是由吕祖谦约集的。宋明之学谈心性者必言事功,言事功者必说心性,合心性与事功为一的宗旨是一致的。黄宗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夫苟工夫著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

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sup>①</sup>

在心学发展史上,元代吴澄的地位至关重要。吴澄(1249—1333),抚州崇仁人,世称“草庐先生”,与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宋元学案·草庐学案》将吴澄列为“朱熹四传”,又是“象山私淑”,是元代“和会朱陆”的人物。他否定了朱熹的“道问学”论,接受了陆学的本心论,提倡读书问学当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本。

吴澄从心能弘、心即仁及心具道三方面,以“弘”统贯心的三种基本含义(知觉之义、主宰之义、道德之义),以“仁”为本心之全德,通过对“心”的辨析疏理,为心学正名。

吴澄说:“士之贵乎弘者,何也?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吾之所以为心也。苟不能充其心体之大,以与天地同,是于心体之全有未尽也。心体之全有未尽,则吾心所具之理,其未能知、未能行者众矣。夫与天地之同其大者,心体之本然也。”他提出心具道的观点,指出“心学”不等于“陆学”,“以心而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皆然。故独指陆子之为本心之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他指出,心学即孔孟之道,陆九渊心学亦承孔孟之道而来。“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由传以溯陆,由陆以溯孟,在此而已。”“道之为道,具于心,岂有外心而求道者哉?”“此一心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以至于孔子,其道同。”这样,他将心学与儒家之道相统一,破除了理学与心学的门户藩篱。

吴澄认为,传道之根本即在于心。他说:“圣门之教,各因其人,各随其事,虽不言心,无非心也。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为太极。’周子曰:‘纯心要矣。’张子曰:‘心清时,视明听聪,四体不待羁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入身来。’此皆得孟子之正传者也。”儒家道统之传便是此心之传,孔、颜、曾、思、孟、周、程、张、邵等皆“明指本心教人”。这样,以“心具道”为理论前提,心学被纳入了道统,与理学同属儒家正统。

吴澄为心学正名,努力使心学获得合法性,而后

① 《明儒学案·序》。晚清温州学者林损认为,永嘉学派在心性、事功、文章方面是合一的。“永嘉诸子非不言心性也,其所谓心性者,经济之心性耳;非不习文章也,其所谓文章者,亦经济之文章耳”;“惟事功而无体,终亦必亡其用;惟心性而无用,终亦必丧其体,体用交丧,而人道于此尽矣”;“永嘉诸子之言事功者,亦必不能离心性。事功与心性合,而后经济之真乃出。使永嘉之学独以经济为名,此固永嘉诸子之幸,而道之裂甚矣。”参见林损《永嘉学派通论》。



来王阳明《象山文集序》开首一句“圣人之学，心学也”，显然也是深受吴澄的影响。

### 三、明代浙赣东心学与启蒙思想带情况——崇仁学派、阳明学派、江右王学与蕺山学派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别号阳明，余姚(今属宁波)人。曾任贵州龙场驿丞，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等。被封为新建伯，谥文成。王阳明是浙江人，却与江西有着密切关系。正德十一年(1516)，他受命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镇压“山贼”。正德十四年(1519)夏，他平定江西宁王朱宸濠叛乱，却被宦官谗害，遭武宗猜疑。他在南昌深居反省，提出“致良知”这一核心概念。所封“新建伯”之新建，也是江西一县。嘉靖六年(1527)，他赴广西镇压“山贼”，途经南昌、吉安、赣州，讲学不辍，听众四集。次年底回归，病卒于南安(今江西大余县)。王守仁死后，江右王学成为传播其学说的重要流派。

江西之于王阳明，更重要的还有两点，一是赣东陆九渊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素以发挥陆象山思想为其职志，他说：“象山辩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宁可得而尽诬之？——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sup>①</sup>二是赣东吴与弼、娄谅崇仁学派对王阳明的发端影响。

吴与弼(1391—1469)，号康斋，抚州崇仁人，崇仁学派创立者。《明儒学案》中，《崇仁学案》位列第一。其弟子分成两派，陈献章得其“静观涵养”，开白沙学派之宗；胡居仁、娄谅等“得其笃志力行”，遂启余干之学。《明儒学案》评价说：“推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所成，微康斋，焉得有后时之盛哉！”吴与弼挑战传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推动工农商贾的儒学化，崇仁之学被认为是第二次文化下移的发端。

娄谅(1422—1491)，号一斋，上饶人。明弘治二年，17岁的王阳明来南昌娶诸氏为妻，返归途中至江西上饶，拜见理学家娄谅，娄谅授之以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王阳明深契之，始慕圣学。

因此，《明儒学案》评价娄谅说：“姚江之学，先生为发端也。”

王阳明还深受吴与弼的另一位学生陈献章的影响。陈献章(1428—1500)，古代广东唯一从祀孔庙的硕儒，因曾在江门白沙村居住，人称白沙先生，江门(白沙)学派创始人，有“岭南一人”“岭学儒宗”之誉。王阳明弟子王畿说：“我朝理学开端，还是白沙，至先师而大明。”<sup>②</sup>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至大。”并赞誉白沙学说是“独开门户，超然不凡”。陈献章提倡“以自然为宗”的修养方法。“自然”，即万事万物朴素的、本然的、无任何负累的、绝对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他要求人们在这种状态中无拘无束地去体认本心，倡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学。他提出“贵疑”论，主张求之于心，进行独立思考，不迷信古人经传。《明儒学案》概括说：“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尝致力而应用不遗为实得。”

陈献章心学是明代心学的开始。它和后起的王阳明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体。章太炎说：“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体系，则自陈白沙始。”近人缪天绶说：“在这个因循蹈袭的空气弥漫一时的时候，而白沙独摆脱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事实上，陈献章较早地突出“良知”“良能”等概念。他曾说：“秉笔欲作一书寄克恭，论为学次第，——大意只令他静坐，寻见端倪，欲说上良知良能一节，使之自信，以去驳杂支离之病，如近日之论可也。”<sup>③</sup>

阳明思想还深受陆九渊弟子杨简的影响。阳明弟子王畿说：“慈湖之学得于象山，超然自悟本心，乃易简直截根源。”又一弟子钱德洪评价杨简说：“德洪尝伏读先生遗书，乃窃叹先生之学直超上悟者乎。”

据学者曾凡朝概括，杨简心学主要内容如下。一是心的内在性——“此心，人之所自有，人所自存”。心作为宇宙的本根是内在于每个人类个体之中生而固有的，圣贤具之，凡人亦完满具之。“圣言千万，皆以明人心之所自有也。”“天下之人心皆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同，皆与天地、日月、

① 《王阳明全书》卷二十一《答徐成之》。

② 《龙溪先生全集》卷十。

③ 林光《南川冰蘗全集》卷末附录。

四时、鬼神同。”二是心的超越性——“是心，四海之所同，万古之所同”，心既是内在于个体的，又是超越个体的。“人人心量皆如此广大”，“人心与天地鬼神之心通一无二”。心是存在于时空的，又是超越时空的。“道心无外内，外心即内心。”三是心的神明性——“此心自明自神”。“人心即道，故曰道心。道心无体，动者为谁？至神至明，我所自有。”“人心无体，至善，至神，至明，至广大。其曰范围天地，发育万物。”四是心的虚而无体性——“此心虚明无体”。杨简所论之心，并非实体性的存在，但又不是空洞虚无。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天地自然人物尽在其中。“人心虚明无体，广大无际，天地人物变化万状，不出吾心量之中。”此心之中，万物毕照毕见，“人心至灵至神，虚明无体，如日如鉴，万物毕照”。“日用平常之心，何思何虑，虚明无体，广大无际，天地范围于其中。”五是心的感通天地之性——“范围天地，发育万物”。杨简认为，形而上的本体之心展现于天地宇宙之中，与万物感通，开显着现实的天地和人文价值世界。“人心非血气，非形体，精神广大无际畔，范围天地，发育万物，何独圣人有之？人皆有之。时有古今，道无古今。形有古今，心无古今。”六是心的道德伦理性——“人之本心自善”。“本心”是道德智慧的不竭泉源，一切道德义理皆自“本心”流出。“谓人之本心无此善者，贼夫人者也；谓己之本心无此善者，自贼者也。”作为万物根源和世界本体的伦理性之心，是一切道德价值的主体根源，“心”的此种意义自孟子开显，从象山、杨简直至王阳明，是一以贯之的。他们都注重“就心上做工夫”，以成就社会人生之道德事业。<sup>①</sup>

王阳明认为：“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

身心上做。”显而易见，杨简心学对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很大，宋明“陆王心学”发展过程中，杨、陈的环节是不容忽视的。

另外，王阳明的一些政治社会主张，如四民皆本、重视工商、讲求事功、学以致用等，受南宋浙东学派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兹不详论。

王阳明致良知学说、敢于怀疑权威的主张，对于弘扬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思想解放、对于思想启蒙等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受到后人的极大推崇。如明末张岱说：“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前言》评价说：“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明末黄景昉说：“王新建能用度外人，收罗甚富，如致仕县丞、捕盗老人、报效生员、儒士、义官、义民、杀手、打手等，皆在笼络奔走中，即土目亦为心死。大都眼高襟豁，从学问澄彻来。”严复说：“夫阳明之学，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为其功夫之节目。独阳明之学，简径捷易，高明往往喜之。”章太炎说：“文成以内过非人所证，故付之于良知，以发于事业者或为时位阻，故言‘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于是有知行合一之说。文成之术，非贵其能从政也，贵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也。”梁启超说：“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日本高濂武次郎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三岛毅说：“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sup>②</sup>

而浙江、江西又是王学传播的两个重要地方。

浙中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钱德洪、王畿。钱德洪，余姚人，王阳明同乡。阳明平定宁王叛乱后，返故里，钱德洪与同邑数十人拜其为师。钱德洪与

① 曾凡朝：《杨简“心”本体阐释》，载《孔子研究》2008年第6期。

② 2015年元旦，笔者瞻仰余姚王阳明故居，曾有诗云：“有儒尚静思，屑屑轻实务。拘谨礼与法，恹恹无自我。圣者出余姚，轰然掀天地。宇宙即我心，我心亦宇宙。立乎其大者，何须尽翻书。当下即是性，何须犯躊躇。日常即是真，大道不离器。人皆可成贤，遍地是尧舜。本心无所屈，舒张无止处。漫漫贯山河，欣欣通生物。皎皎似日月，勃勃如赤子。虽千万往矣，浩浩养正气。刀锯不能害，贬谪何所惧。飘扬鄞阳波，宸濠立成缚。书生能知兵，功封新建伯。古谁堪比拟，三国有陆逊。后来最肖者，戎马曾与李。能破网与罗，势如大堤决。欲脱羈绊人，慨然信此说。孔孟董朱后，万古又一哲。时序元旦日，故居寒而澈。龙山千年秀，姚水自澄碧。后学恭而敬，依依成追慕。”

王畿代师疏通学术大义,一时称其为“教授师”。阳明出征在外时,钱、王二人代师主持书院。王畿,别号龙溪,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前后四十年无日不讲学,自北京、南京及吴、楚、闽、越等地,到处都有讲舍,被尊为儒宗。王畿被称为“良知现成派”。他认为“良知”原是当下现成、先天自足的本体,无须学习思虑,亦无须修正损益,便自然可以得到。他说:“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任此一点虚明,不为旦昼梏亡,便是致知。”<sup>①</sup>他主张“君子之学,贵于自然”;警惕、慎独、恐惧等,不仅无益于学问与修养,反而会妨碍真性流行。他从自然主义走向了放任主义,主张保持人心活泼之体,反对任何约束。他说,“人心虚明,湛然其体,原是活泼,岂容执得定。惟随时练习,变动周流,或顺或逆,或纵或横、随其所为,还他活泼之体,不为诸境所碍,斯谓之存”,“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如空中鸟迹,水中月影,若有若无,若沉若浮”。黄宗羲指出其流弊,认为王畿所谓“一着功夫,则未免有碍虚无之体”,是“近于禅”,致使阳明之学渐失其传。

值得一提的是,阳明心学还直接促成了明代中后期文艺与社会思想的解放。阳明心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泰州学派,亦称王学左派,从王艮、徐樾、颜钧、罗汝芳到何心隐、李贽等,离经叛道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说:“吾心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他们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主张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主张“百姓日用即道”,<sup>②</sup>“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sup>③</sup>“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sup>④</sup>他们敢于用“本心”去推倒偶像的崇拜和教义的束缚,洋溢着一种叛逆的勇气和张扬个性的精神。心学与禅宗相结合,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启了明代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文艺与社会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其中,罗汝芳、汤显祖和徐渭值得特别一提。罗汝芳(1515—1588),号近溪,抚州南城人,泰州学派的“唯一特出者”、集大成者。他的老师颜钧

(颜山农)认为,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远不会泯灭的,因此,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制欲。罗汝芳听后如醍醐灌顶,接受了这种“制欲非体仁”论,认为“大道只在自身”,提倡用“赤子良心”“不学不虑”去“体仁”,主张“拟不学为学”“以不虑为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被誉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先驱。汤显祖(1550—1616),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江西临川人。他曾从罗汝芳读书,又受李贽思想的影响,传奇《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汤显祖等将追求现世享受的“情”与“理”相对立,提出了“世总为情”“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的命题,宣扬“情”的解放。徐渭(1521—1593),绍兴山阴人,字文长,他与心学人物季本、王畿、唐顺之、薛应旂、钱德洪等都有交游,这对其尊重事物自然本性和提倡“本体自然”的文艺主张影响很大。因适性顺情而“放诞不羁,每出于名教之外”的“狂士”所兴起的高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的思潮,对于冲破僵化思维、强化主体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带有浓厚的思想启蒙色彩。

黄宗羲说:“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江西的王门弟子被选入《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者多达30人,其中安福邹守益,泰和欧阳德,永丰聂豹,吉水罗洪先、邹元标,新建魏良弼,南城邓元锡,南昌章潢等都是杰出者。王守仁去世后,其学术曾被定为“伪学”,但反而更受推崇,尤其是江西门人坚守不移,促成天下王门弟子到处聚讲,蔚然成风。江右王门以江西为中心,东南半壁为腹地,展开书院讲学、讲会讲学及乡约教育活动,建立、主讲之书院共有48个之多,将明代书院自由讲学运动带入高潮。

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刘宗周(1578—1645),则是明代心学的殿军人物。他是绍兴山阴人,因讲学于山阴戴山,学者称戴山先生,历任工部左侍郎、左都御史等,明亡,从事抗清活动,失败后绝食而死。刘宗周早年不喜象山、阳明之学,认为陆王心学容易导致禅学化。他曾说:“王守仁之学良知也,无善无恶,其弊也,必为佛老顽钝而无耻。”但到了中年,“悟天下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学”,转向了陆王心学,认为“只此一心,散为万化,万化复归于一心”,“大哉心

① 《王龙溪语录·龙华会记》。

② 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

③ 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④ 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乎,原始要终,是故知死生之说”,完成了对心学从“始而疑”到“中而信”的转变。“慎独”说是刘宗周学说的宗旨。他说:“《大学》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慎独而已矣。”他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独”即本心,即良知,是人具有的一种主观道德能力,“慎独”则是一种内省的道德修养功夫。刘宗周说:“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先生(指王阳明)言致良知,正指此。但此独字换良字,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诚意”与“慎独”密切相关。刘宗周说:“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止言心,则心只是径寸虚体耳,著个意字,方见下了定盘针,有子午可指。”又说,“心之主宰曰意,故意为心本。不是以意生心故曰本,犹身里言心,心为身本也”。因此,“意”是“心”之本体,是人心超越的价值,是“至善”,是“道心”,是“至善之所上”。诚意、慎独与致知、正心实际上是合一的,没有先后之分,格物致知的目的就是诚意,这样,达到本体与功夫的合一,由诚意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刘宗周在《阳明先生传信录》中指出:“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教学者支离眩鹜、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雷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刘宗周是当时儒林的泰山北斗,追随他的学者众多,如黄宗羲、文学家陈子龙、戏曲理论家祁彪佳、书画家陈洪绶、哲学家陈确与张履祥等。

#### 四、清代浙东心学与启蒙思想带情况——清代浙东学派与穆堂学派

清代浙东学派创始人黄宗羲,主要代表有万斯同、章学诚、全祖望等。黄宗羲(1610—1695),余

姚人,王阳明同乡,字太冲,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清代浙东学派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专制的启蒙色彩,二是兼通经史,三是经世致用的学风。<sup>①</sup>黄宗羲是刘宗周的学生,对宋以来的各个学派进行综合。全祖望评价说,黄宗羲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指薛季宣)、止斋(指陈傅良)之经制,水心(指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sup>②</sup>。

浙东学派具有明显的兼通经史的特色。南宋叶适说:“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专于经则理虚而无证,专于史则事碍而不通。”<sup>③</sup>主张经与史、理与事结合。而清代浙东学派也认为,学者“必先穷经”,“必兼读史”;“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sup>④</sup>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sup>⑤</sup>此说直接继承了王守仁“《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之说。章学诚又说:“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sup>⑥</sup>

浙东学派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特色。南宋叶适提倡“务实而不务虚”,清代浙东学派也主张“经世应务”。黄宗羲说,“经术所以经世”,谈史“而后足以应务”。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他反对“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问学”<sup>⑦</sup>。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黄宗羲“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对王守仁“致良知”作了新解释,认为“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梨洲一生无日不做事,无日不读书,独不提倡静坐参悟一类工夫”。因此,梁启超认为,黄宗羲“是王学的修正者,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的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

①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浙东学术》篇。清初,浙东、浙西学术同出明末刘宗周。杭嘉湖地区的浙西学者主要有桐乡张履祥、吕留良,平湖陆陇其,嘉兴朱彝尊等,尊朱以经世。章学诚归纳为“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

② 《梨洲先生神道碑》。

③ 《水心文集》卷十二。

④ 《甬上证人书院记》。

⑤ 《文史通义·易教上》。

⑥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⑦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

阳明心学强调“心外无理”“良知即天理”,是一种高扬主体性并具有启蒙倾向的人文主义学说。在政治社会思想方面,清代浙东学派继承南宋浙东学派与王阳明学派的主张,发出了古代启蒙思想的最强音。

一是对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黄宗羲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批判,是具有民主启蒙性质的政治思想。《明夷待访录》一书批判专制、解放人性、提倡民主,发出了古代启蒙思想的最强音。他提出了“君为民害”论和“民主君客”论。他从秦汉以来田产私有的土地关系中得出了“天下是百姓的天下”的结论,指出君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无疑是世上最大的盗贼。他从人生来就自私自利立论,认为天下百姓和君主一样,生来就有自私自利的权利,因此君主和天下人具有平等的权利。他抨击后世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又进而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也。”他称“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公天下”就是统治者能为百姓服务的天下,是能使百姓各得其私、各得其利的天下。另外,他主张“公其非是于学校”,保障民众的议政权与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权。

二是工商皆本、富民、义利统一观。浙东学派以“切于民用”为标准,提出了“工商皆本”。历代统治者都把“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黄宗羲等浙东学派反对这一经济伦理观念。黄宗羲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只有民富才能国富,“夫富在编户,而不在府库”。他们还反对国家打着抑兼并的旗号来压制、侵夺富民的财产。在“义利”观上,浙东学派反对空谈义理,主张义利统一。黄宗羲对孟子的“何必曰利”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事功与仁义并未分别,“后世儒者,事功与仁义分途”,非孟子所说仁义。他认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人应尽其所能为社会服务,但社会对个体的权益也不应漠视。

清代最著名的心学家李绂则被梁启超誉为“陆王派之最后一人”“结江右王学之局的人”。李绂(1675—1750),字巨来,号穆堂,抚州临川人,其代表

的学派被钱穆称为穆堂学派,钱穆称其是“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历任广西巡抚、直隶总督等要职。

李绂与田文镜的互参案,显示出李绂敢于反对君主专制的凛然正气、捍卫道统独立尊严的大无畏勇气,以及作为心学人物的高尚情操。雍正帝把官场因循守旧、结党营私等陋习简单地归结于科举制度与科甲官员,也有故意打击所谓的“科甲朋党”,以挫伤士人所代表的道统的独立尊严、加强君主专制主义的企图。他所信赖的田文镜被包括李绂在内的大批科举出身的官员认为是苛待士人的酷吏。雍正三年(1725),李绂被任为直隶总督。在赴京途中,得知河南总督田文镜苛待士人,李绂不畏强权,直斥田文镜“身任封疆,有意蹂践读书人”。他上疏弹劾田文镜,田文镜反告李绂结党营私,李绂等许多科甲官员遭受重大打击。李绂三次入狱,但他没有屈服,“身系狱中,日诵书饱啖熟睡,同狱甘肃巡抚称其真铁汉也。两次决囚,雍正命缚至西市,以刀置颈,问:‘此时知田文镜好否?’对曰:‘臣虽死,不知田文镜好处’”。杨希闵《乡诗摭谭》中称李绂“古文直达肝膈,无所缘饰”,“诗有才气,凌厉无前,尤工次韵,挥斥如意”,吴越间诸名士皆为叹服。清初文学家王士禛称其有“万夫之稟”,全祖望称他“尽得江西诸先正之裘治”。

李绂培养、提拔了全祖望、厉鹗、钱陈群、顾栋高等著名人物。而李绂对全祖望的知遇之恩,则可谓是浙赣东心学与启蒙思想带历史上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

全祖望(1705—1755),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清代浙东学派重要人物。雍正十年(1732)全祖望考中顺天乡试时,户部侍郎李绂任主考官,他看到全祖望的考卷,大加赞赏,两人遂成为师友、忘年交。李绂邀请全祖望、万承苍(号孺庐,南昌人)居住在自己的住宅紫藤轩,虽然生活清苦,有时只吃粗麦饭,喝葱花汤,但他们考据经史,即席论文,相谈甚欢,达两年之久。他们曾借读《永乐大典》,每日必读完20卷,并雇人抄录其中的珍贵资料。全祖望自言私淑黄宗羲,章学诚《浙东学术》排定谱系时,以全祖望为清代浙东学派第三代。但他受李绂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所以,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全祖望系在李绂之后。

在清代浙东学派中,全祖望在弘扬民族意识、褒扬民族气节方面受黄宗羲的影响最大。他作了许多南明人物传,表彰民族气节,极具感染力。著名史学



家陈垣选择全祖望《鲒埼亭集》作史源学教材时,就说是为了“正人心,端士习”。全祖望《梅花岭记》记载了明末史可法扬州抗清事迹,“初忠烈(指史可法)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等句,饱含着作者深沉的情思,也隐含着汉族士人对满清曾推行的民族仇杀与压迫政策以及对清朝君主专制主义的强烈愤恨。

以上即是浙赣东心学与启蒙思想带的大致发展脉络,发掘其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对于深化对古代心学史、启蒙思想史的认识,对于发掘浙赣东区域

优秀文化资源、打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2]孙德高.王阳明事功与心学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 [3]王凤贤,丁国顺.浙东学派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 [4]吴立群.元代理学中“仁”的价值意义——吴澄境界论探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s12).
- [5]高炳生.黄宗羲启蒙思想再评价[J].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s5).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

## On Ancient School of Mind and the Psychology and Enlightenment Belt in Eastern Zhejiang and Jiangxi

Li Yichun<sup>1</sup> Li Leyu<sup>2</sup>

(1.Research Institut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315211;

2.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Tianjin 300387)

**Abstract:** From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o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cholars in eastern Zhejiang and Jiangxi contact closely such as Lu Jiuyuan, Yang Jian, Ye Shi, Chen Liang, Lv Zuqian, Wu Yubi, Lou Liang, Wang Yangming, Wang Ji, Luo Rufang, Tang Xianzu, Xu Wei, Liu Zongzhou, Huang Zongxi, Li Fu, Quan Zuwang, they have obvious mutual influence or inspiration,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The region of eastern Zhejiang and eastern Jiangxi exist a belt of psychology and enlightenment belt, have become a spectacl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Key words:** eastern Zhejiang and Jiangxi; School of Mind and enlightenment belt; Lu's and Wang's School of Mind; Zhejiang School

(上接第 103 页)

证案例,为党和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事实上,对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我国社会事业发展这一系统性的社会探索而言,本研究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果进一步理性思考,我们将会发现在项目的空间布局与运作特点的背后,还隐藏着更为关键的命题,即为何云南会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摇篮?这些组织为何如此青睐于教育发展项目?这些组织的独特性及其真实目的何在?其在云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作用有哪些?对云南的民族教育理念和传统教育方法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又对在云南的国内本土非政府组织带来了怎样的挑战,等等。这有待课题组及后续学者进一步研究与深入挖掘,同时也应该引起相关政府部门及国内本土组织的广泛

关注。

#### 参考文献:

- [1](美)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3版)[M].扶松茂,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2](美)莱斯特·M·萨拉蒙.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的视界[M].贾西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3]韩俊魁.境外在华 NGO:与开放的中国同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 [4]王名,刘培峰.民间组织通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 [5]王妮丽,王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云南的项目运作[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 [6]沈玲,何星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云南的活动现状与对策研究[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责任编辑 胡号寰 E-mail:huhaochuan2@126.com